

姚伯茂

XUESHULUNWENJI

学术论文集

姚伯茂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YAO BOMAO

姚伯茂

XUESHULUNWENJI

学术论文集

姚伯茂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姚伯茂学术论文集/姚伯茂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4

ISBN 978 - 7 - 216 - 05983 - 1

I. 姚…

II. 姚…

III. 哲学—文集

IV. B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42948 号

姚伯茂学术论文集

姚伯茂 著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文字六 0 三厂

印张:11.25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插页:9

版次: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56 千字

定价:28.00 元

书号:ISBN 978 - 7 - 216 - 05983 - 1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目 录

从放牛娃到大学教授的历程(代序)	1
浅评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讨论	9
附录1 上海市地方志记述:在批判杨献珍“合二而一”论的同时,集中批判姚伯茂	16
附录2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发文为姚伯茂在“合二而一”问题上蒙受的冤案平反	16
附录3 百度网站在“名士最多的地区——绍兴市”栏目,介绍学者姚伯茂	16
再评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讨论	17
重评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讨论	26
我在“合二而一”问题论战中的遭遇	30
“斗争哲学”在我国的由来和发展	36
再谈“斗争哲学”的含义及其由来和发展	42
“斗争哲学”是“左”倾思潮的理论基础	47
“斗争哲学”必须彻底抛弃	57
只讲斗争不讲同一,不是唯物辩证法	61
能否说“一分为二”即是对立统一规律	69
评哲学就是“明白学”	70
加强哲学的方法论功能是哲学改革的根本方向	73
范畴精确化,体系严密化是实现哲学新的大发展的重要方面	81

论哲学教学的出发点与归宿点	88
论矛盾的含义	94
再论两种类型的矛盾观	106
论联系、发展和矛盾之间的相互关系	112
谈谈两种类型的矛盾	120
论两种不同类型的矛盾与思想方法	124
关于“差异就是矛盾”和矛盾同一性的内容问题	132
划分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标准是什么	142
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吗	146
论转化范畴在辩证法中的地位	148
《应该给形而上学一点地位》质疑	158
关于矛盾问题精髓的探讨	163
论作为矛盾同一性的对立面之间的共同点	167
斗争性与同一性之间决不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	177
关于绝对相对的几个问题	182
也谈辩证法的规律与范畴	187
质量互变规律——《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2》词条	191
质与量——《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2》词条	194
度和度量关节线——《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1》词条	196
关于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基本内容及其表述的管见	197
正确认识机遇 善于捕捉机遇	202
事物内容和形式的多样性	207
评“一刀切”的思想方式	210
认识的源泉是实践而不是物质	215
“一切经过试验”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223
谈谈有关真理的几个问题	228
略论影响实践标准彻底贯彻的几个认识问题	236

论作为实践结果的客观事实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240
什么样的实践效果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247
论生产力标准是实践标准的深化和发展	253
关于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的几个问题	258
论历史唯物主义的“物”	266
关于生产力发展动力问题的探讨	276
再谈人的需要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	281
评“一俊遮百丑”说	283
重评“综合经济基础论”	289
重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伦理观	297
论人的全面发展及其与科技革命的关系	303
怎样认识上升时期资产阶级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	311
科学技术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考察	314
从国际共运史看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	325
科学社会主义的新世界	331
试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同利益群体的矛盾及其协调	334
如何用生产力标准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	340
从民族虚无主义到卖国主义	345
关于共产主义必胜信念的基础	351

从放牛娃到大学教授的历程(代序)

我这一辈子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苦难的童年和少年；二是蒙冤受辱、患难坎坷的青年；三是幸福快乐的中老年。

我1937年1月出生于浙江诸暨东和乡姚上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新中国成立前，家里只有薄田三亩，只是依靠父母的辛勤耕耘，才能勉强度日。每年青黄不接时，就得向村里的富裕人家用高利贷借钱借粮，还常常以三亩田作抵押。据我母亲说，她一共生过十四个孩子，其中十三个都因旧社会农村缺医少药而先后夭折。唯独我命大，活了下来。

我出生那年，恰逢“七七卢沟桥”事件，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期间我亲身经历的有两件事，至今仍然记忆犹新。一件是1941年我4岁，有一天听到“风声”，说日本鬼子马上就要进村扫荡。我父母匆匆忙忙拿了点粮食，带着我往山上避难。到山上以后，父母发现衣被都没带来，晚上怎么过夜？于是，把我留在山上，他俩回家去取衣被。意想不到的他俩走后不久，日本鬼子放火烧村里两家富户的房子，只见火光冲天，烟雾腾腾，吓得我哇哇大哭。第二件事更是惊险万分：1942年的一天，日本鬼子再次进村扫荡。我家的一位邻居大伯挑一副担子，前面竹篮里坐着五岁的我，后面竹篮里装着粮食和衣被，急匆匆往山上避难。谁知途中遇到几个日本兵，示意我们停下来，其中一个鬼子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刺刀，在我面前晃来晃去，吓得我魂飞魄散，号啕大哭。我那位邻居大伯吓得心惊肉跳。不过，也许是鬼子良心发现，动了恻隐之心，折腾一番后，居然放我们走了，真可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光阴似箭，转眼间我已经到该上学的年龄。我父母目不识丁。父亲深感不识字的苦楚和务农的艰辛，下决心要让我读书，以便有朝一日能跳出农门，不再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于是，父母节衣缩食，含辛茹苦供我读书。命运常常捉弄人。小学毕业那年正当解放前夕的1949年，兵荒马乱，人心惶惶，新旧两种教育体制交替，学校无心组织我们去考初中，我父亲对于小学毕业后可以考中学，以至于可读大学这类事，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而我又年幼无知，因此，拿到毕业文凭后就糊里糊涂地回家继承了父业——“修理地球”。当年家里养了一头小黄牛，我很自然

的成了放牛娃。从此以后,放牛、割草、砍柴、耘田、割稻、车水、挑牛粪和猪粪……什么农活都干。小黄牛吃饱喝足后,高兴得狂奔,而我小小年纪,挑着一担柴,哪里追得上,只好朝它哭。七月的天气,说变就变,刚才还艳阳高照,转眼间乌云密布,电闪雷鸣,暴雨倾盆,正在田里割稻的我们,只能跑到石桥下面去避雨,从桥缝里流下来的脏水,淋得我们像只落汤鸡,刚才还汗流浹背,此时已冷得发抖。夜半三更去车水抗旱,与蚊子作伴。耘田时常常被蚂蟥叮得两脚鲜血淋漓。十二岁的小孩挑七八十斤重的猪粪、牛粪,爬四十五度上山陡坡,常常是一面挑、一面哭。如此这般的生活,足足干了两年半。

命运的转机发生在1952年春节前夕的一天。同村好友姚成江小学毕业后考入了枫桥学勉中学读初中。这一天正好他放寒假回家过年,他动员我去考学勉中学。经他的悉心辅导,经几天复习,我顺利地考取了学勉中学。经过两年半的寒窗苦读,于1954年夏天拿到了初中毕业文凭。由于家里实在太穷,我和班上志趣相投的五位同学决定去金华报考中专,以便早日毕业、工作,挣钱养家糊口。我报考一所医药专科学校的药剂师专业。谁知许多学生的想法都和我们一样,报考中专的人特别多,而招收名额却少得可怜,录取率很低,我们六个人全部名落孙山。有道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时,诸暨县暨阳中学(后来改名为诸暨中学)首届招收高中生,我决定投考,结果金榜题名。

在三年高中期间比较愉快和顺利,申请到助学金,高二时加入共青团,还当过生活委员、副班长。我们的班主任是党员,还专门找我谈话,叫我写入党申请。遗憾的是学校里党员很少,学生中根本就不发展党员。值得自豪的是,我的一篇作文被语文教师选定为范文,在他任教的几个班级当众宣读。这也坚定了我考大学时选择报考文科的决心。改革开放前政府政策多变,大学招生政策也是如此。1956年大学招生名额很多,而考生远不能满足要求,于是动员机关干部、小学教师去报考大学。1958年发动“大跃进”,大学招生也大跃进,录取率很高。唯独我们1957年毕业的这一届大学招生名额突然大幅度减少。当年全国有三十万高中毕业生,而大学(包括大专)只招十万七千。当年我校高三毕业生有两百人,结果只考取四十人。我有自知之明:数理化没学好,而作文是我的强项,扬长避短,决定考文科。看到复旦大学的招生广告:哲学系的培养目标是高等学校教师和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我想大学教师是多么高尚的职业,说不定有可能做

大学教授！因此，第一志愿就填报复旦大学哲学系。为了实现这一梦想，在复习迎考期间，我夜以继日地刻苦用功。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如愿以偿，我成了全村第一个名牌大学生，也是第一个大学教授。

1957年8月底，我来到复旦大学报到，开始了五年的大学生活。那时上大学不仅不收学费，还随录取通知书寄来家庭经济情况调查表和助学金申请表。我一进复旦大学，就享受乙等助学金：包括每月十二元伙食费（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三百元伙食标准）、三元零花钱（甲等为四元，丙等为两元）。来自福建的学生还补助棉被、棉衣。每个学生还可以申请一张保暖的草垫，有一年我还补助到一件很时髦的列宁装棉衣。我从心底里感激党和政府对我的栽培。

1958年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开始了。系党总支书记郭仁杰老师提出全系师生到农村去劳动锻炼。于是，1958年2月新学期一开学，我们就奔赴浙江海宁钱塘江人民公社劳动锻炼。当时规定必须与贫下中农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我的房东是一个道士，每逢有丧家来请，他就去做道场。我将每月的伙食费全部交给他家，但吃得实在可怜：早上吃稀饭，没有酱菜，只能放点酱油。一个月不见一点荤菜。后来我被调到另外一个小队，东家也随之调换，只有母女两人。老太太待我像亲生儿子一样，伙食也大为改善。但好景不长，不久大办食堂的运动开始了。墙上到处贴着标语：“鼓足干劲搞生产，敞开肚皮吃饱饭。”强制每家每户必须把粮食、蔬菜、猪、羊全部交给食堂，灶头、铁锅被砸，我被调到食堂担任会计兼做杂活。食堂开办头一两个月，蔬菜、米饭供应十分充足，每天下午三四点钟还供应点心，每星期吃一顿猪、羊肉，大家吃得很开心，但从第三个月开始，米、菜都吃光了，食堂没法开伙，只得宣布散伙。紧接着更加荒唐的事情发生了：举国上下提出响亮的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只要想得到，啥都能办到”。于是，有人大胆地想到了亩产五六万斤稻谷。我所在的钱塘江人民公社为了创造这样的奇迹，就发动包括我们这些大学生在内的全公社青年，将一亩田深翻三四尺，再把七八亩田已经扬花抽穗的稻子拔起来种到那亩田里去，名曰“深耕密植”，如意算盘是原来七八亩田的产量，现在合并到一亩田，成为一亩田的产量，岂不能创造出亩产几万斤的奇迹吗？！谁知事与愿违，由于违背最起码的科学常识，结果可想而知，不是创造出什么奇迹，而是颗粒无收。这是我亲身经历的“大跃进”运动。这年十月我们撤离海宁，返回学校读书。

三年“大跃进”，导致“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大学生受政府照顾，但从1959年开始定量，我每月三十五斤。如从现在看来，这么高的定量，哪里吃得完！但在那个特殊年代饭也特殊加工：快要蒸熟时喷上冷水，使饭发松开花，食堂饭师傅用勺子打给你半斤米饭，实际上三两都不到，而且这样的米饭很不耐饥，再加上没有油、没有荤菜，每顿两条很小的面拖胡萝卜就冒充荤菜，蔬菜是几片卷心菜黄叶子。刚吃饭不到两小时，肚子里就唱“空城计（饥）”。那年月每个大学生除了定量，每月还供应半斤黄豆。我们外地学生一般都是委托食堂煮成“酱油黄豆”。吃完饭以后，再吃半斤“酱油黄豆”，比现在吃山珍海味还要有味道。

经过五年寒窗苦读，1962年夏天，终于拿到了由陈望道校长签发的复旦大学毕业证书。但是，毕业分配又是一道难以跨越的坎。因为当年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各个单位不但不要进人，而且纷纷裁员，动员职工把户口迁回自己的老家去。大学生毕业分配也就成了一个难题。自7月拿到毕业文凭，分配方案却迟迟下不来，我们只好打麻将消磨时光，坐卧不宁，焦急万分。一直等到9月下旬，望眼欲穿的分配方案终于下达了：我和郭丰生分配到上海工学院。听到这一喜讯，我笑得合不拢嘴。

1962年9月25日办妥了复旦大学的离校手续，兴冲冲地去上海工学院（1978年改名为上海工业大学，1994年合并为上海大学）报到。领到了生平第一笔（半个月）工资24元，然后到马列主义教研室报到。教研室主任唐瑛娟老师接待我俩。她说因为哲学课师资紧缺，因此，要求我俩抓紧时间备课，准备下学期就开课。因为我在大四、大五时就在几家工厂和人民公社讲过课，有现成教案，也积累了一定的教学经验。所以，唐主任下达的教学任务，我已成竹在胸，一点也不胆怯。为了一炮打响，我抓紧时间备课。1963年春节过后，新学期开始了。在一个梯形教室，面对机械系七个班级210名学生，开始讲大学教师生涯的第一堂课。我讲课比较生动有趣，学生听得津津有味。课后学生普遍反映：这样的课听起来有味道，如果枯燥无味，谁还乐意听呢！

正当我为讲课效果得到学生好评而沾沾自喜时，意想不到的大祸悄悄向我袭来。事情是这样的：1964年7月19日我在《人民日报》“学术研究”专栏发表处女作《浅评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讨论》（7月31日《文汇报》转载），在哲学界首先提出了新的矛盾分类法和矛盾转化形式多样性的新观点。文章发表之初，赞扬声不绝于耳，纷纷夸奖我年轻有为

(当年我 27 岁)。《文汇报》的一位记者立刻就来找我,说:“以前你给我报投来过几篇稿子,都因为你是无名小卒,没有录用。现在你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高水平的论文,真是了不起。请你无论如何也给我报写一篇。”于是我又写了《再评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讨论》,该报于 8 月 2 日发表了。尽管 7 月 31 日同一版上发表了复旦大学哲学系我的两位师兄——周诗裳、金顺尧写的,批判我的处女作的文章:《不能以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但我拜读以后,实在不敢恭维:强词夺理,狗屁不通,不是以理服人,而是气势汹汹,盛气凌人。所以,我也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在我的冤案平反以后,金顺尧自知理亏,特地托人向我赔礼道歉)。

谁知到了 9 月风云突变,祸从天降,厄运扑面而来,打击迫害接踵而至。1964 年第 16 期《红旗》发表署名为“本刊评论员”的文章:《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文中写道:“有人装着要对矛盾作具体分析的样子,将矛盾分为‘以同一性为主’和‘以斗争性为主’两类,说什么解决‘以同一性为主’的矛盾要合二而一。”这篇评论员文章的发表,就是向全国哲学界发出了一个信号。于是,全国各大报刊、杂志闻风而动,每天都连篇累牍地发表批判、攻击、围剿我和杨献珍的文章,我被贬称为“上海小杨献珍”。这样的批判、围剿,历时将近一年(对我进行集中批判、围剿的情况,上海市地方志有详细记载)。1980 年 12 月我应邀去北京参加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中央党校和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发起的“全国唯物辩证法讨论会”。会议期间,《人民日报》理论部编辑特地来找我,向我披露了我的处女作在该报发表的前后经过。同时,经中央党校教员艾恒武先生引见,我专程去杨献珍先生府上拜访。老杨献珍见到“上海小杨献珍”,感到特别亲切,他与我谈了一个多小时,夸奖我的处女作很有水平,富有创造性。

俗话说福无双全,祸不单行。“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戴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以“撰写反动文章,公然反对毛主席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光辉思想,为刘少奇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提供哲学依据”的罪名,遭到批斗,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

个人的前途和命运,总是同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休戚相关。邓小平同志领导的改革开放使民富国强,同时也让我这个普通的知识分子进入幸福、快乐的天堂。1979 年 10 月下旬的一天,上海工业大学召开全校教职员大会,会上校党委书记张华宣布为我在“合二而一”问题上蒙受的冤案平反。1980 年 3 月 8 日,《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时发表中共上海市委

宣传部的文章:《为学术界过去受到的错误批判平反》,文章列举了受迫害的学科和有关同志:“如哲学方面,关于‘合二而一’问题的讨论,后来变成了对杨献珍同志以及赞成杨献珍观点的同志的围剿;当时李佐长、姚伯茂同志发表了不同的意见,都受到株连,遭到围攻。”从此以后,我时来运转,因祸得福。包括《人民日报》的王若水先生、《文汇报》、《解放日报》、《学术月刊》、《复旦学报》等多家报刊,纷纷向我约稿。《文汇报》总编辑马达先生和副总编辑张启承先生还特地邀请我和著名教授蒋学模、邓伟志等作者,在和平饭店宴请。我先后在《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辽宁日报》、《哲学研究》、《学术月刊》、《江汉论坛》(湖北)、《人文杂志》(陕西)、《东岳论丛》(山东)、《思想战线》(云南)、《社会科学》(上海)、《社会科学辑刊》(辽宁)、《青海社会科学》、《复旦学报》、《上海大学学报》、《人文科学论坛(上海工业大学学报)》等报刊、杂志,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我还应邀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撰写多个词条。其中发表在《光明日报》的《重评“综合经济基础论”》、《关于生产力发展动力问题的探讨》(与尹继佐合写)以及发表在文汇报的《划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标准是什么》三篇论文,《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前面两篇还作为重要文章,其题目登在该期的封面上。《重评“综合经济基础论”》收录在由杨西光主编的、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社会变革中的哲学思考——1978年至1986年〈哲学〉专刊论文选》中。发表在青海社会科学的《加强哲学的方法论功能是哲学改革的根本方向》和发表在《历史唯物主义论丛》(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论历史唯物主义的“物”》两篇论文,荣获上海市社联“优秀学术成果奖”。发表在《文汇报》的《评“一俊遮百丑说”》一文,得到了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吴邦国同志的赞赏,他看后对《文汇报》理论部编辑周锦尉先生说:“姚伯茂同志的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发表在《文汇报》的《从民族虚无主义到卖国主义》一文,在该报“论苑”版发表的同时,还在该报当天头版作为重要文章作特别推荐介绍。发表在《复旦学报》的《只讲斗争,不讲同一,不是唯物辩证法》一文,《光明日报》在《哲学》专刊特地摘登作特别推荐。发表在《上海大学学报》的《论人的全面发展及其与科技革命的关系》一文,被选入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时期社会科学成果荟萃》第一卷。处女作更是被许多出版社出版的《经典文献》刊载。我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专著《对立统一学说新论》(该书的一些观点被许多作者引用),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质量互变的辩证法》(与石国强合

著),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吉林大学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出版编著、合著、主编哲学读物和大学哲学教材十二本。其中有一本合著荣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在百度、Google、雅虎、中搜等多家网站,点击姚伯茂,就可以搜索到我的标准像和生平业绩,包括台湾、香港、北京、上海、浙江、绍兴、深圳等境内外城市和大学的图书馆,都收藏着我的著作。百度、Google 网站,在《名士最多的地区——绍兴市》的“本站文章”中,在介绍了周恩来、鲁迅、马寅初、邢贲思等诸多绍兴籍名人的同时,介绍了“最早提出新的矛盾分类法和矛盾转化多样性观点的学者——姚伯茂”。

我的命运在改革开放前后恍若隔世。改革开放前,自 1962 年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至 1977 年,整整十五年,生活动荡不安,经常提心吊胆,夹着尾巴做人,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来,正当青春年华,极大部分岁月都是在工厂、农村、农场、安徽凤阳“五七”干校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进行劳动改造、接受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过程中消磨掉,职称始终是助教,工资始终是六十元。经济拮据,处境艰难,社会地位极度低下。改革开放后则一帆风顺,安居乐业,专心致志于教学和科研,并且成为受人尊敬的知名教授和学者。1978 年晋升为讲师,198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 年晋升为副教授,1986 年与徐匡迪同时晋升为教授,享受厅局级待遇。并受钱伟长校长聘请,担任人文社会科学部主任(县处级),1992 年又受钱伟长校长聘请,任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1994 年又受钱伟长校长聘请,任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直至延聘三年后于 2000 年退休。连续五届聘请为上海市高校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政治学科组成员,以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系列高级职称评审专家组哲学学科组副组长。自 1981 年“全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成立之日起,连续五届当选为研究会理事,以及上海市哲学学会常务理事,直至退休后主动辞职。1987 年 9 月荣获上海市人民政府授予的“记大功”奖励;1991 年 7 月荣获由中共上海市教委授予的“上海市高等学校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荣誉称号;1994 年 9 月荣获由中共上海市教委和上海市教委联合授予的“上海市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课、马列主义理论课优秀教师”荣誉称号。我的生平业绩和传略,已载入《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教授人名录》、《上海市高等教育系统教授录》、《上海当代社会科学家评传》、《当代上海社会科学学者辞典》、《当代上海社会科学家学术

传记》、《浙江教育名人》、《越中名人谱》、《浙江绍兴市地方志·人物志》、《绍兴市教育志》、《浙江古今人物大辞典》、《中国哲学年鉴》、《中国高等教育专家名典》、《复旦学子》、《中国社会科学家大辞典》、《中国当代学者大辞典》、《世界文化名人辞典·华人卷》等二十余种公开出版的名人录中。

出版《姚伯茂学术论文集》的直接原因是,我在参加全国性学术会议以及初中、高中、大学的校友联谊会,以至重阳节老同事、老同学、老朋友聚会,大家在了解了我的坎坷而曲折的经历后,都不约而同地要求和希望读到我的论文,尤其是对那篇处女作特别感兴趣,都有一种神秘感,纷纷向我索取,尽管我复印多次,但还是供不应求。再说,近日我仔细阅读我写的这些论文,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即使今日看来,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自感还是有出版价值的。所以,在纪念祖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今天,从一百余篇学术论文中,挑选出五十八篇,编就这本论文集,奉献给广大读者。

承蒙湖北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尤其是邓涛先生为拙作的出版发行花了许多精力,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使我获益匪浅,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姚伯茂

2008年12月于上海

浅评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讨论

近来,《光明日报》连续发表了不少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讨论文章。在这些文章中,多数同志都是在矛盾同一性的意义上,使用“合二而一”这个词的。因此,除了其他一些争论的问题以外,究竟如何理解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是争论的焦点之一。在这一问题上,以艾恒武、林青山两位同志为一方,以项晴、沙人两位同志为另一方,展开了针锋相对的争论。我觉得双方都有可取之处,但是各有片面性,尤其是都缺乏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的精神。这里发表点粗浅看法,期望批评指正。

大家知道,矛盾规律,或者说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规律,无论在自然界、社会和思维领域,都是普遍起作用的,任何事物在任何时候都包含着内部矛盾。所谓矛盾,就是统一物分解为两个既相互依赖、相互联系,又相互排斥、相互斗争的方面或趋势。简言之,矛盾就是既对立又同一。这就是说,同一性与斗争性是任何事物在任何时候都包含着的两个不可缺少的方面。这是矛盾的普遍性。但是,一个具体的统一物,究竟包含着哪两个对立面,这两个对立面怎样相互联系、相互斗争,斗争的结果又怎样向自己的反面转化,则因事物而异,千差万别,各各不同,这又是矛盾的特殊性。所以,我们既要以对立统一规律作为普遍的指导原则,又要注意对具体矛盾进行具体分析,切忌把矛盾的某一种情形,误认为是矛盾的所有情形,因而削足适履,一概而论。

我以为撇开每个矛盾各自的特殊性不谈,按照矛盾双方同一性与斗争性的不同情形,可以将矛盾分为两种类型。为了说明问题,不妨先分析几对矛盾。

第一种类型的矛盾,如: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资产阶级不能离开无产阶级,否则它就失去剥削的对象,当然也就不成其为不劳而获的资产阶级了;反之,无产阶级也不能离开资产阶级,否则它的财产不被剥夺,也就不成其为无产阶级了。但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资产阶级为了过那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的生活,必然要剥削掠夺无产阶级,又为了防止无产阶级起来反抗,就必然要进行残酷的镇压,而无产阶级为了生存,

也必然会起来与资产阶级作斗争,两者是针锋相对、水火难容的。解决这个矛盾,不能用“结合起来”、“统一起来”、“合二而一”的方式,必须通过你死我活的斗争。而斗争的结果,是无产阶级消灭或者战胜资产阶级。

同样,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也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它们共同存在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中,两者之间是针锋相对、水火难容的,它们代表着根本相反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决不能和平共处,互不干扰,这种矛盾也必须通过你死我活的斗争,才能得到解决,决不能把它们“结合起来”,“统一起来”,“合二而一”。而斗争的结果,是马列主义战胜或者克服修正主义。

另外,诸如先进与落后的矛盾、正确与错误的矛盾、多快好省与少慢差费的矛盾,高度的革命精神与暮气沉沉、干劲不足的矛盾等等,都是属于这种类型的。

第二种类型的矛盾,如:

红与专是对立的统一。红与专是有区别的,红不是专,不能代替专,专也不是红,不能代替红。只红不专,做一个空头政治家是不行的,只专不红,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甚至做出危害人民利益的事情,当然更是不行的。红与专又是相互促进、相互渗透、相互体现的。精神可以转化为物质,一个人思想觉悟很高,时刻想到党和人民的事业,就会奋发图强、刻苦钻研技术;反之,如果个人主义很重,整天考虑如何吃喝玩乐,自然分散精力,也就“专”不起来了。因此,“红”是统帅,是专的根本前提,但“红”又是通过“专”具体地表现出来的。一个不肯钻研业务、整天空谈为人民服务的人,很难说已经“红”了。白求恩大夫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精神,首先体现在他全心全意为伤员治病这一点上。因此,红与专是完全统一的,而不是针锋相对、水火难容的,在处理两者关系的时候,不需要通过你死我活的斗争。任何人为地把它们绝对对立起来,认为要“红”就不能“专”,要“专”就不能“红”,或者先专后红,先红后专等观点都是错误的。而应该把两者结合起来、统一起来、联系起来,“合二而一”。所以,毛主席和党中央号召我们,必须做一个又红又专、能文能武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

同样,高度的革命精神与严格的科学态度也是既对立又统一的。革命精神说的是要有热情,科学态度说的是要冷静。热与冷是对立的,但革命精神与科学态度又是相互促进、相互渗透、相互体现的。科学态度决不是前怕狼、后怕虎,畏缩不前,躺着不干,而是要对客观事物进行科学分析,掌握大量真实可靠的数据,进行煞费苦心的思考。而要做到这样,没有高度

的革命精神是不行的。愈发挥革命精神,就能掌握更多的数据,思考的功夫愈周到,就愈能做到科学分析。反之,高度的革命精神,并不是叫大家盲目蛮干,乱碰乱撞,而是要按照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充分发挥自觉的能动作用,促进事物的发展,愈是科学分析,愈能更好地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就愈能促进事物的发展。因此,高度的革命精神与严格的科学态度,不是针锋相对、水火难容的。在处理两者关系的时候,不能人为地把它们绝对对立起来,而应该把高度的革命精神与严格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统一起来、联系起来,“合二而一”。

另外,诸如劳与逸的矛盾,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的矛盾,中心工作与一般工作的矛盾,工业与农业的矛盾,多快与好省的矛盾等等,都是属于这一类型的。

在分析了以上的几对矛盾以后,我们就可以给这两种类型的矛盾之间划一条界线了。它们的区别似乎有这样几点:

第一,虽然无论哪种类型的矛盾,对立着的两方面都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但是对立或者排斥的程度却是不尽相同的:第一种类型的矛盾,对立的双方是针锋相对、水火难容、根本相反、全面排斥的。如资产阶级的反面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反面是资产阶级;马列主义的反面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的反面是马列主义;多快好省的反面是少慢差费,少慢差费的反面是多快好省。与此不同,第二种类型的矛盾,对立面双方并不是针锋相对、水火难容、根本相反、全面排斥的,而只是局部排斥的关系。决不能说红的反面是专,专的反面是红;科学分析的反面是革命精神,革命精神的反面是科学分析;多快的反面是好省,好省的反面是多快,如此等等。

第二,虽然无论哪种类型的矛盾,都同时包含着同一性与斗争性,但是同一性与斗争性在它们之中所占的地位却是有所不同的。第一种类型的矛盾,对立面双方以斗争性为主,如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矛盾、先进与落后的矛盾,都必须通过针锋相对、你死我活的斗争才能解决,决不能象现代修正主义所宣扬的“阶级合作”论那样,把两个阶级结合起来,调和阶级矛盾。因此,我们不妨称这类矛盾为以斗争性为主的矛盾。第二种类型的矛盾,则以同一性为主。解决红与专、高度的革命精神与严格的科学态度、劳与逸、中心工作与一般工作、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工业与农业、多快与好省等矛盾,并不需要对立着的两个方面进行针锋相对、你死我活的斗争,而应该把两者结合起来、统一起来、联系起来,